

党的创新理论实践典型案例

变革『及时雨』再润边疆『南泥湾』

新疆兵团团场综合配套改革见闻

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1日电(记者李志浩)离乡隔山岳。再一年就要退休的重庆人赵洪顺,屯垦边疆已有22年。20世纪90年代,家乡的土地养活不了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了他第二个家。

如今,他正在经历兵团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

2017年,新疆兵团启动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短短几年,改革释放的红利量多分足,基层职工群众广泛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赵洪顺所在的第六师五家渠市一〇二团梧桐镇4连,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当地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单产长期在300公斤徘徊,改革后,2020年单产突破400公斤;农业生产大幅度降本增收;2020年,全连60多户年收入超过20万元,20多户超过50万元。

【实践故事】

回顾扎根新疆的22年,赵洪顺对兵团的感受有过几次大变化。90年代初来时,兵团农业的发达让他惊讶:“都用机械种地,每月还有几百元的工资,这些在老家哪里敢想?”

先进农业的背后,是几代兵团人艰苦卓绝的耕耘;南泥湾的屯垦奇迹,在数千里的戈壁荒漠延续。

1999年,赵洪顺成为兵团第六师一〇二团职工,团场将数十亩耕地交给了他。但种什么、怎么管理、如何收购,全由自上而下的生产指令决定。

数年间,通过专业而高效的行政指令,兵团农业实行“五统一”(统一种植计划、统一农资采供、统一产品收购、统一农机作业层次和收费标准、统一技术指导)。

正是“五统一”,让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使屯垦农业从无到有,迅速以千亩为单元实现集约化:全国六分之一的棉花产区、国内最大的节水农业灌溉区相继建成,近90%的农业综合机械化率领先全国。

但进入21世纪,随着祖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兵团与市场经济脱节的问题开始凸显。

高强度的行政指令限制了市场的开放。兵团职工张程利记得,10多年前,团里统一规划种植番茄。番茄品质远高于地方,却只能交付团办企业,扣杂比例高达12%-15%,远远高于地方的5%。

曾经的优势逐渐掣肘兵团发展,职工群众被捆住手脚,干群矛盾突出,企业不强,经济结构不优……一段时间,兵团对五湖四海建设者的吸引力开始减弱,一些基层甚至面临老龄化、空心化危机。

屯垦戍边事业发展遭遇瓶颈,重重困难。

2017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战略部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一场关系300多万兵团职工群众的变革之风劲吹天山南北,团场综合配套改革成为其中重中之重。

作为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第六师五家渠市率先全面取消“五统一”,改变大包大揽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通过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让职工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激发其生产积极性。

封闭的门户向市场打开。赵洪顺和同事们第一次可以自主选择农资和农机服务。选择权带来了议价权,优惠和服务登门而至。

自上而下的指令不再,连队如今所有的事务,均须大家“一事一议”。连队“两委”(连队党支部委员会、连队管理委员会)不再由上级任命,而是改由连队民主选举。

另一方面,兵团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改革各环节、各方面、全过程,尤其在基层,有效扭转过去基层党组织作用弱化情况。

赵洪顺感慨,改革后,干群关系焕然一新,连队“两委”服务意识提升明显。“灌溉水不够的时候,他们会里里外外费大力气帮我们协调,跟我们关系近多了。”

为更好接轨市场,兵团近1800家团办企业全部与团场行政分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张程利带领职工群众,以合作社的方式“抱团”,通过利益联结机制重新“统一”生产和销售,保持团场农业集约化的优势。

谈及这次改革,天山南北基层职工群众频频称赞。赵洪顺就要退休了,但他将继续参与合作社的经营,“我年轻时来的时候,是觉得这边没有发展前途。这次改革,对我们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我更不会走的。”

【案例点评】

近几年,记者走访天山南北兵团各团场,眼见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给职工群众带来切实的红利和实惠。改革不仅仅为生产力发展“解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大幅度提升了团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许多受访职工群众表示,这次改革可谓“及时雨”,让兵团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作为兵团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石,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强化,行政职能得到健全和转变,财政管理体制得到改革,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团体体制机制实现了系统性、革命性重塑,兵团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明显提升。

大数据赋能,精准高效接返打工人

浙江绍兴以信息化作支撑提升“就业专列”效能

本报记者李坤晟

日前,随着G2187次列车缓缓驶出成都东站,绵阳人李含强和绍兴永通印花有限公司的20余名四川工友一同踏上返岗之旅。

“以前,每年春运要自己抢票。现在有了‘就业专列’,公司和政府对接,直接安排好,解决了我们打工人的大难题。”已在浙江绍兴务工20多年的李含强在电话中对新华社记者感慨。

此时,1900公里之外,永通印花总经理助理毛学泽已联系好去杭州东站接站的大巴车。为欢迎员工返岗,他特地置办了一面2.5米长的横幅。

“公司外订订单排到了3月份。与以往员工东一个西一个自行安排行程不同,今年我们有20多名川籍骨干员工搭乘‘就业专列’一起回厂,公司生产计划能很早就确定下来。明天公司复工,14台印花

机至少能开10台。”毛学泽对记者说。

李含强和毛学泽口中的“就业专列”,是绍兴市委市政府为帮助外省务工者尽早安全返岗,保障本地企业复工复产,开行的3趟专列。从2月20日至28日,G2187(成都东-杭州东)、G1961(郑州东-绍兴北)、G2334(贵阳北-绍兴北)3趟列车,每趟车170个座位,可惠及约4000名来自浙江省外的务工者。

据绍兴市就业促进和人力资源中心主任潘晓东介绍,这是继2020年春节后,绍兴市再次开通“就业专列”。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外省员工无法及时返岗,当地企业面临无人开工的窘境。为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绍兴市组织从“家门口”到“厂门口”的“就业大巴车”,开行全国首趟湖北就业大巴和专列,接返3.61万名员工。

潘晓东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国内疫情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地区仍有零星

散发病例。2021年,绍兴继续开行“就业专列”,主要为保障外贸订单充足的企业及时开工。而相较去年,今年“就业专列”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提高接返效率。

为确定线路,绍兴市人社局通过对比社保数据库参保信息,发现贵州、四川、湖南、河南和安徽5省在绍兴的参保人数最多,结合前期流动人口数据,最终选定了这5个省份作为今年开行专列的主要方向。

“为避免企业和员工误报,通过与铁路部门协调,每条线路固定一个车次。”潘晓东说。

为保证报名便捷和精确,绍兴市人社局充分利用信息手段,提供了企业报名系统、个人申报平台和电话报名热线3条路径。

来自贵州六盘水的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员工黄祖荣接到短信通知,他

预订的列车车票已出票。“公司发给我们一个微信小程序,我们按照表格填好什么时间在哪个站点上车就行。操作非常简单。”黄祖荣说。

据了解,员工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热线电话报名,信息会先发送给其所在企业。企业相关负责人核实填报后,系统会要求上传身份证照片,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后台,即时审核信息,确保报名无误。

目前,已有近500家绍兴当地企业,3000余名员工报名2021年的“就业专列”。截至农历正月十五,绍兴“就业专列”已接返员工2283人。

连续两年开行“就业专列”,绍兴人社部门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潘晓东表示,“就业专列”只是一个开始,人社部门将在劳务协作等多项工作上更充分地挖掘数据价值。

“以后去中西部招工,我们能根据不同县市务工人员的不同特点偏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潘晓东说。

闽北山区:“保姆校长”喜迎留守“寄宿娃”



新华社福州3月1日电(记者邓倩倩、赵雪彤)3月1日,春季开学第一天。清晨六点半,位于闽北山区的政和县西洋畚族小学苏醒了。校长庄桂淦与妻子梁纯爱敦促孩子们快起床,帮着低年级的孩子

穿好衣服。守过47个春秋,每次开学,仍是庄桂淦心中最有仪式感的日子。

“孩子们睡回来了,不仅校园热闹起来了,假期以来我空落落的心也终于被填满了。”春回大地,孩子们如期返校,庄桂淦很开心。

这是福建南平山区唯一一所村级寄宿制小学。当地外出务工者多,在读的160多个学生中过半数是留守儿童,有83个寄宿生,70多个来自单亲家庭。年过六旬的庄桂淦是校长,也是既管学

习又管生活的保姆大家长。

庄校长说,大多数孩子的父母因外出打工,没法管他们,因此学校的责任不仅是教书,更要教他们做人。

政和县法院的法官1日走进校园,给高年级同学带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知识。“对这些留守儿童来说,法制教育非常重要,他们可以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懂得以后的人生要走正途。”庄桂淦语重心长地说。

不少孩子都说,相比家里,自己更乐意来学校。10岁的叶恩汇是全托的寄宿生,她说:“虽然我也会想家里人,但是周末梁奶奶会给我煮水饺、汤圆,家人也常来看我。”

孩子口中的“梁奶奶”便是庄校长的妻子梁纯爱。家长们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所小学就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庄校长夫妇,能给孩子们家一般的关怀。

多年前,庄桂淦和同为教师的妻子梁纯爱收留了几个全托的留守儿童。消息传出,远近的困难家庭不断地把孩子送来,从10多个到80多个,算下来,这些年大概有2000名留守儿童从这里毕业。

今年又多了几个新转学来的外来务工者子女。学校床位供不应求,于是庄桂淦设置了一个特殊“门槛”:谁家更困难,就先接纳谁家的孩子。

“这些孩子比较特殊,他们很敏感,所以要尽可能呵护他们完成学业。”庄桂淦说,“将来,他们会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图片:3月1日,西洋畚族小学校长庄桂淦在新学期开学仪式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从“龙鳌之争”到“龙鳌共舞”

温州鳌江流域两县一市竞合巨变的故事

本报记者谢云挺

“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浙江与福建相邻的温州鳌江流域,是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这里原来是平阳县辖区,改革开放后,发展分化成平阳、苍南、龙港三个县级行政区,它们在竞争与合作中,不断开花散叶。

现如今,又逐渐走向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之路,一个温州副中心的现代都市圈正在崛起。

“龙鳌之争”到“龙鳌共舞”

1981年,人多底子薄的平阳县,获批准分县发展,新设苍南县,两县划江而治。

苍南建县后,敢为人先。当时,首创“挂户经营”、首创农民包机、首创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等不少在全国影响广泛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在鳌江入海口南岸崛起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

当地干部群众说,分县之前,鳌江北岸的平阳县鳌江镇是整个流域的经济中心,有“小上海”之称,苍南龙港镇的崛起迅速成为平阳鳌江镇的竞争对手。

建桥故事反映了两岸的认识变化。龙港建镇之初,曾多次向北岸鳌江镇提议,在两岸建城区联合架设一座市政桥,以结束群众往来长期依靠渡船之苦,但是,

鳌江镇怕“肥水流入外人田”,任凭龙港要求再三,就是不同意。

不想几年之后,龙港声名大噪、实力大增,情况反过来了。鳌江镇开始主动提出建桥,而以前有很大热情的龙港镇则成了“消极派”,背后原因也是忧心自己的蛋糕被抢去。于是双方僵持,建桥事情又被耽搁。

直到温州市政府介入,这座命名为“瓯南大桥”的两岸沟通之桥,在2007年终于建成通车。

建成这座大桥,让两岸认识区域合作发展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双活之路。

三地竞合 互补共兴

如今,鳌江入海口两岸,高楼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气象,4座大桥已把两岸城区连成了一片。

2019年9月,因改革而生的龙港镇,经国务院批准,实现了“镇改市”的蝶变,成为全国第一个不设乡镇和街道的新型县级市。

“重任在肩”的龙港市,设市一年多来,全面实施民营企业“龙腾计划”,打造印刷包装、新型材料、绿色纺织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着力培育新能源装备、医药卫生材料、通用机械等三大重点新兴产业。“龙港要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撬动全领域改革”,龙港市委书记郑建忠说,以政府数字化转型撬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努力创建全国首个全域整体智治示范城市。

龙港建市了,鳌江怎么办?这是鳌江

镇,也是平阳面临的最大的现实课题。

平阳县县委常委、鳌江镇委书记何占宇说,平阳县的目标定位是把鳌江镇建设成温州南部副中心的核心区。“龙鳌同根同源,应该共同构建城市核心区。”为了推进建设城市核心区,平阳县在鳌江镇加快城市能级提升。最近,世界500强企业正威国际集团投资120亿元建设正威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中心项目,以及对标上海浦东城市品位,总投资150余亿元占地近2000亩的“中国金茂·古鳌头”产城融合项目,在鳌江沿岸新区开工建设。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龙港从苍南分出后,苍南县喊出“为新苍南的再次崛起拼尽全力”的口号。苍南县委书记陈永光表示,苍南重整行装再出发,在中央、省市发展大局中找准新苍南站位,强攻坚、勇争先、开新局,高质量推进“浙江美丽南大门”建设。

坐拥商贸优势的苍南县,近年来的发展重点落在交通区位、新能源和生态旅游领域,以县城灵溪镇为中心的现代化商贸新城正在崛起。如今,龙港分设,灵溪镇更以苍南“排头兵”姿态,与龙港开展竞争与合作,带动辐射周边乡镇。

新增长极正崛起

在温州到福州400多公里沿海经济带,鳌江流域正好处在中间位置。在鳌江流域建立形成中心城市,将为整

个浙南闽北地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鳌江流域两县一市,总人口230万人,以鳌江之畔龙港市与鳌江镇地域为中心,放眼流域两岸腹地,南面的苍南县以县城灵溪镇为核心形成了现代化商贸新城,北面的平阳县城昆阳镇与鳌江镇已全面进入昆鳌联体发展阶段。彼此各具优势又相互联动,形成全流域一体化融合态势。

2019年底,《温州都市区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发布,龙港、苍南和平阳一起,都被纳入温州都市区副中心范围,要求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转型,推进副中心向心发展。这对打造高水平温州都市区南部副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5月,龙港与苍南两地签订了《苍南与龙港两地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围绕发展规划协同、设施项目协同、产业体系协同、环境提升协同、民生工作协同、公共事业协同,建立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目前,龙港与平阳也在研究制定推进两地协同发展方案。

据了解,2020年,鳌江流域的GDP已逾1200亿元,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温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邵平说,当前,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加快高质量建设温州都市区南部副中心,为温州打造千万人口大都市提供重要动能。

鳌江流域原属一体,现是三家,未来发展是否会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在这片热土上群众有理由期待。